

《水浒传》杰克逊译本研究 ——从布迪厄的“信念”(doxa)谈起

路东平,张璐

(兰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信念”(doxa)是布迪厄社会学理论工具之一,源自行动者对客观世界的误识(misrecognition),是正统与异端的切分。将布迪厄的“信念”引入翻译研究,可与场域、资本、惯习共同探究译本背后的社会因素;并以此为基础,研究《水浒传》杰克逊译本1963版和2010版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研究发现,翻译场域中的信念,在资本上表现为译者进入目标场域实践的资格,在惯习上表现为译者种族中心主义或尊重多元文化的翻译倾向,在场域上表现为译者对行动者间利害关系的识别;杰克逊受其信念影响,表现出种族中心主义的翻译倾向,打造出通顺晓畅的1963版译本;2010版译本由爱德文·劳作为编辑,更新人名、称谓与度量衡的翻译,并借用沙博里译本的译名作为副标题;最终译本的背后是多个行动者所持信念的斗争与妥协。

关键词:翻译研究;信念;场域;资本;惯习;《水浒传》杰克逊译本

中图分类号:H315.9; I0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9)01-0062-08

Study of Jackson's translated version of *Water Margin* ——beginning with Bourdieu's doxa

LU Dongping, ZHANG L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Gansu, China)

Abstract: Doxa, one of the conceptual tools in Bourdieu's sociology, originates from social agent's misrecognition of the objective world, and can be regarded as the division of orthodoxy and heterodoxy. The introduction of doxa into translation studies might assist the research in the social factors behind the translated text with field, capital and habitus. Then, on the basis of the study,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factors behind the translation of *Water Margin* (1963 version and 2010 version) by J. H. Jackson are examined.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doxa in the translated field illustrates the qualification of the translator

收稿日期:2018-10-10

基金项目: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学科研创新学术团队建设项目(16LZUWYXSTD007)

作者简介:路东平(1966-),男,甘肃镇原人,副教授。

to practice in the target field in terms of capital, his translating tendency to ethnocentrism or cultural diversity from the aspect of habitus and his recognition of power relations between agents on the basis of field. Influenced by his doxa, Jackson produced a smooth and transparent *Water Margin* (1963 version) under his translating tendency to ethnocentrism. *The Water Margin* (2010 version) was proofread by Edwin Lowe who updated the translation of personal names, titles and units of measurement, and borrowed the title of Shapiro's translation of *Outlaws of the Marsh* as the subtitle. The translated text as the final product is underpinned by the struggle and compromise of agents with different doxa.

Key words: translation studies; doxa; field; capital; habitus; *Water Margin* by J. H. Jackson

目前为止,《水浒传》共产生4个英译全本(70回以上),分别是初版于1933年的赛珍珠译本(以下简称“赛译”),1963年的杰克逊译本(以下简称“杰译”),1980年的沙博里译本(以下简称“沙译”)和1994~2002年登特杨父子(以下简称“登译”)的译本。其中,杰译、登译研究不足^[1],尤其是杰译。3篇专论杰译的论文^[2-4]分别探讨译者对习语、被动句式、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在多译本比较中,魏莉认为相较赛译和沙译,杰译的创造性叛逆程度最突出,在交际功能上达到理想效果^[5]。孙建成将杰译策略提炼为“删改式的文化帝国主义归化”,指出杰译肯定《水浒传》的人文精神,但多以英语叙事结构和修辞置换原文叙事风格^[6]。刘克强利用语料库技术验证杰译删减最多,意译程度最高。由此,杰译研究目前仍处在翻译研究的语言层面,未将其外部社会因素与内部语言转换结合^[7]。相较于其他3个译本,杰译中多见省略和释意性翻译,沙博里认为杰译的“译文相当不准确”^[8]。然而,凡行为必有缘由,文本背后折射的是诸多因素交织成的社会经济网络。

近年来,翻译社会学作为翻译学文化转向后的交叉性学科逐渐兴起^[9]。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与翻译研究的结合日益紧密,目前主要集中于场域、资本、惯习三大概念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然而其研究潜力并不拘于此。本文试将布迪厄的“信念”(doxa)引入翻译研究,与场域、资本、惯习这三大关键概念共同分析翻译过程;并以此为基础,聚焦杰译的1963版和2010版,探讨文本背后的语言因素与社会文化因素,分析杰克逊的翻译策略。

一、“信念”探微

(一)何为“信念”

在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大纲》中,“信念”(doxa)被定义为:“在某些情况下,若客观秩序和组织的主观原则(如在古代社会中),有近乎完美的对应,那么自然和社会,看上去是‘不证自明的’。这种经历,我们称之为‘信念’(doxa),以区分于‘正统’(orthodoxy)和‘异端’(heterodoxy)。后两者暗示着对不同或敌对信念的可能性的认识和承认。”^[10]

信念产生的原因,是行动者对客观世界的误识(misrecognition)。误识是布迪厄的关键术语,指的是“对一整套实践中的政治经济利益的否定”^[11]。客观秩序,作为权力的表征,通过实践内化为行动者的心智结构,经由实践进行自我再生产,把潜在的利益关系伪装成超功利的追求,即客观的社会结构和主观的心智结构,形成具有本体论属性的契合。行动者经受实践的熔炼后,承认了权力施受的合法性。信念,由此而生。

具体来讲,布迪厄将行动者对场域的认识分成信念领域和意见领域。图1是行动者对场域的认识,如图1所示,信念领域即无须争论的(undisputed)领域。所有行动者均遵守社会惯例,心照不宣地按规行事。信念领域之中,并非只有共识,还存在相互对立的观点。意见领域即“需争论”的(disputable)领域,正统意见与异端学说在其中为争夺合法性而斗争。行动者思考并言说自然和社会的方式,若为当前场域所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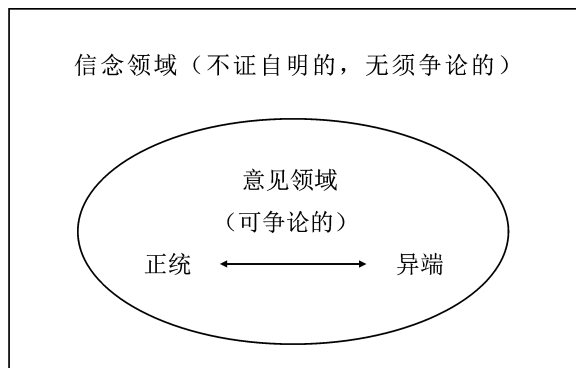


图1 行动者对场域的认识

受,是为正统;反之,则为异端^[10]。而信念领域和意见领域之间的区别,本身即是场域内斗争的关键点。占主导地位的正统思想经由斗争强加给行动者;行动者通过自身实践,再生产对正统的认同,以此扩大信念领域的范围。

因此,简单来讲,信念在行动者那里表示“一种自然和社会的不证自明”。场域内行动者总是在什么是“无需争论”的,什么是“需争论”的(disputable)这一点上达成共识(commonsense),并进行实践。场域中,居于被支配地位的阶层希望缩小信念领域的范围;而居于支配地位的阶层则希望捍卫信念的完整性,一旦失败,便退而维护其天生就不完美的替代品,也就是正统。

(二)信念与场域、惯习、资本

信念与场域相契合,是“确立于实践过程中——惯习和场域之间——的直接附着关系”^[12]。更深入地讲,信念和场域内成员资格(member-ship)相关的知识效果有密切关系。行动者入场域实践前,须达到该场域的特殊要求。每个场域都要强征一笔类似“入场费”的东西,而这种东西又确定了谁更适于参与这一场域,从而对行动者进行优胜劣汰的遴选^[13]。这一“入场费”,指的是行动者须有能力判断并分类场域内的实践对象,甄别什么是需特殊处理的,什么是无需质疑的,并时刻关注贯穿场域之中的利害关系^[14]。这种利害关系,指的是正统和异端之间的力量对比和紧张状态。行动者需满足场域的遴选标准,才可进入

场域中实践。

行动者的“入场费”,包括其所掌握的信念和其对正统、异端的认识,体现为一种知识效果,一种身体化的知识^[12],表现为行动者占有的资本。“入场费”随着行动者的实践,内化为“可持续的、可转换的倾向系统(System of disposition),倾向于使被结构的结构(Structured structures)发挥具有结构能力的结构(Structuring structures)”^[12]。这一倾向系统被称为惯习。更精确地讲,“入场费”首先内化为行动者心智结构中的分类图式(Classificatory scheme),即惯习分类实践对象的能力;并通过生成图式(Generative scheme),再生产客观秩序,即惯习生成社会结构的能力^[15]。从这一角度讲,信念的获得过程与资本、惯习、场域的建构过程密不可分。

因此,从信念出发理解场域、资本、惯习,可表述为:行动者入场域中实践,尝试维护或改变自己在场域中的地位,需要信念作为支撑。这种信念表现为行动者所掌握的身体化的资本。与这一资本对应的是行动者在场域中具体化资本的能力,表现为惯习。

二、翻译场域中的信念、资本和惯习

译者信念在翻译场域中的建构,如同其惯习和资本的获得,来源于其独有的生活轨迹(Life trajectories),包括译者的家庭出身、童年生活、教育状况等,尤其是译者在母语环境和译入语环境中的生活经历。

第一,译者的信念在实践中首先表现为对实践对象的甄别:什么是“无需争论的”,什么是“需争论的”。若原语和译语指称、所指和意义互相对应,译者就无需特殊处理。若发生错位,翻译便无定论,就处于“需争论”的待处理状态中。因此,译者须从“信念”出发,对作为处理对象的文本作出判断。

第二,译者的信念表现为对场域内利害关系的认识。意见领域中正统和异端的区别,在于其是否

为场域中的权力机构所言说。翻译,作为跨语际的交流活动,历来受到场域中权力关系的影响。翻译场域中的正统表现为主流文化倡导的文化诗学、翻译规范等;而异端表现为小众文化、或反主流文化支持的文化偏好、翻译策略等。从泰特勒到20世纪,归化翻译成为翻译原则的不二法门,在英美翻译场域中占据支配地位。在和谐、一致、可读性、流畅性等规范的掩盖下,“种族中心主义的翻译暴力”实施的是对外国文本的侵略,巩固的是译入语文化规范,强化的是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之间的距离,代表了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策略。相反,在民国初期的文学翻译场中,以胡适、周作人为首的先锋派向以林纾为首的保守派发起冲击,批判强调译笔雅驯的旧的翻译标准,倡导选择名著、忠实原作、运用白话文,强调异国情调,尽量保存“洋气”,以丰富本国语言,逐渐扩大场域中的信念领域,推进文学翻译中心范式的转移^[16]。可见,译者面对具有“可争论”属性的待处理对象,需时刻注意贯穿场域的力量对比和紧张关系,在正统和异端之间择其一,指导翻译。

第三,译者的信念作为一种知识效果,体现为译者身体化的跨文化资本和跨文化惯习^[17]。跨文化资本为翻译场域而生,但并不局限于译者的文化资本,还涵盖译者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西米奥尼把译者的跨文化惯习分为职业惯习和社会惯习^[18]:前者强调语言惯习和偏好,包括但不限于对语言得体性的感知、写作风格、语域转换能力、对经典文学的态度、对文化事项的品味等;后者着重于语言文化之外的因素,如个人脾性、社会关系与偏好、对职业尊严的认知等^[19]。二者熔铸于译者独有的生活轨迹中,形成译者独特的实践逻辑,影响翻译活动的微观操作(直译/意译、异化/归化)和宏观文本的选择(选择符合或颠覆本国价值观的内容),指挥并调动译者完成语言文本的转换。

译者在正统和异端之间择其一,在原文和译文之间调停,呈现出两种倾向:种族中心主义的翻译倾向,即以自身种族文化或强势种族文化为中心;尊重多元文化的翻译倾向,即尊重翻译当中的异质

因素。正如异质的引入须归化的策略^[20],两种倾向并非完全对立,而是和谐又矛盾地统一在最终译本当中。无论译者总体上呈现出何种倾向,一切均以译者所要实现的目的为前提。

首先,以场域中占据支配地位的译者为例。由于资本的积累、惯习的塑造需要时间的积淀,占据支配地位的译者,常为老派译者(Veteran translators)。他们一般表现出以母语为中心的种族中心主义倾向,把外国文本简约为占据主导地位的母语文本,从翻译文本的选择到翻译策略、审美倾向,均强调和母语文本保持一致。这是对正统翻译规范和文化诗学的遵从,占据支配地位的译者以此维护自身在场域中的优越地位。然而,若场域内的主流规范倡导创新和革命,尊重多元文化的倾向便成为正统。此时,占据支配地位的译者倾向于尊重原文,突出原文的异质性,运用目的语中的古词、俚语,营造一种不和谐的“多重复调”^[21],使读者能够品味原汁原味的语言。

其次,场域中的信念具有动态性。“在一定的社会形构中,客观结构越坚固,在行动者倾向中的自我再生产就越完全,信念领域中被当做是‘理所当然’(不证自明)的部分就越多。”由此,信念随空间、时间的不同而不同。从空间上讲,不同场域内的信念存在差异。东西方翻译场域内对“无需争论”和“需争论”的分类千差万别,体现在文本中时,主要取决于译者对于目标读者占有的文化资本和阅读期待的认识。从时间上讲,“需争论”的可演化为“无需争论”的。在实践改变场域的同时,也会逐步改变场域内成员对“需争论”的共识,“信念”也随之变化。随着场域交流的深入,对于译入语场域成员来说,原来难以理解、无法翻译的对象,现在也可归入“共识”中。

因此,从信念出发,分析翻译场域中译者的惯习和资本,可以认为:译者欲进入某场域实践,是需要特殊要求的,即是否达到“信念”设立的“隐性门槛”,是否能够鉴别场域内的待处理对象,是否能够识别场域内的利害关系。这种信念作为一种知识效果,来源于译者的实践。译者进入场域,利用其

占有的跨文化资本,按照其跨文化惯习处理那些“无需争论”和“需争论”的文本。面对“需争论”的对象,译者有两种选择,或遵循正统,或追随异端,表现出种族中心主义的翻译倾向和尊重多元文化的翻译倾向,二者虽立场不同,却有机融合于译本中。然而,在翻译过程中,这些因素并非单独起作用,而是连同编辑、出版商、读者、国家权力机关等,共同影响译者的翻译思想、译本选择、翻译动机和翻译策略。以斗争为主线,并为最终产品而谋求合作,是场域内实践的常态。

三、布迪厄 doxa 概念下 《水浒传》杰译研究

杰克逊受雇于上海商务印书馆,于20世纪30年代着手翻译《水浒传》,1937年出版70回本的节译本;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对节译本加工修改,于1963年出版全译本。其供职的商务印书馆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现代出版机构,与北京大学同誉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双子星”。杰克逊为商务印书馆工作,表明其掌握相当不俗的资本,足堪进入《水浒传》翻译场域,并承担将其引介入异国他乡的重任。

(一)1963 版杰译研究

杰克逊翻译《水浒传》,与当时的场域结构密切相关。20世纪30年代,杰克逊出版《水浒传》金圣叹70回本的节译本。当时,中国国内战火纷飞,各方势力争相发声。而《水浒传》塑造了一批个性鲜明的英雄人物,寄托了作者对历史的深刻思考。杰克逊也认为:“《水浒传》又一次证明人类灵魂的不可征服的、向上的不朽精神,这种精神贯穿着世界各地的人类历史。”^[22]行动者的实践与场域结构互为表里。相较于增添招安情节的容于堂100回本,杰克逊选择金圣叹70回本,更符合当时读者的信念领域。

1963年的全译本主要是对节译本的修改完善。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从国际上看,殖民主义和民族独立运动的斗争愈演愈烈。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民权运动、女权运动等具有“解放”“反抗”意味的

社会独立运动如火如荼。因此,节译本与1963版全译本所处场域背景发生变化,但《水浒传》因其文本中蕴含的反抗精神,一直是其被选择翻译的主要原因。因其经典性,其文本被选为翻译的源文本,也意味着场域内行动者相信其内在价值,成为实践中的待处理对象,背后是行动者的信念做出的判断和选择。

在翻译思想方面,杰克逊身处西方强势文化之中,受到英美数百年来归化翻译传统的影响,表现出种族中心主义的翻译倾向。杰克逊在全译本的扉页引用了英国作家、历史学家贝洛克(J. Hilaire Belloc)的一句话:“翻译表现民族间秩序的状况,因而也表现民族间地位的状况。在更广阔的领域内,正是这种状况造就了一种普遍文化的存在。”这里的“普遍文化”指的是作为强势一方的英美文化,其所主张的规范代表着场域中的正统。而“译入语文化中的主流文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读者对要在这种文化中取得地位的译本的期待视野”^[23]。因此,杰克逊不免对原文进行有意识、无意识的删改。况且,赛译《水浒传》珠玉在前,保留了原文的原汁原味,但在“叙事”“传意”“通顺”上有所欠缺。如此利害关系之下,杰克逊简洁扼要地展现原文故事情节^[21],为其译本在场域中挣得一席之地。因此,异质因素的传达徒添读者的阅读负担,却难以满足他们对故事的阅读期待。在杰克逊的翻译场域中,这类文化资本处于次要地位,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 欠额翻译文化负载词

在杰译中,文化负载词作为文化资本常处于欠额翻译的状态,传递交际信息,却丢失文化内涵。

例1:原文:小人家萤火之光,照人不亮^[24]。

杰译:Here we can offer you little help^[24-25]。

赛译:This humble home of mine is very small and it is as insignificant as a firefly's light^[26]。

例2:原文:小人有眼不识泰山,一时冒渎兄长,望乞赎罪^[24]。

杰译:I failed to recognize your eminence and I hope that you will forgive me for that blunder^[25]。

赛译: Although this humble one has eyes he did not know T' ai Mountain, and now in this instant of time have I carelessly insulted you. Ten thousand times I hope I can be forgiven^[26].

两个译本对“小人”“萤火之光”“泰山”做出不同的处理。杰译中仅保留了3个文化负载词的理性意义,而省略其象征意义,带有异域特色的意象在翻译过程中被有意识地抛弃,避免给英美读者造成阅读障碍。赛译则逐字翻译,刻意保留汉语的文化意象,但容易造成语义的失落和意象的错位。因此,杰克逊对原文文化资本的浅化处理,一是为了突出其译本明白晓畅的特点,与赛译的忠实特点做区分,二是为了迎合当时信念领域中的欧洲中心原型,避免动摇译入语文化规范在场域中的正统地位。

2. 章回体小说叙事风格的消失

为简洁明快地表现水浒故事,杰译《水浒传》将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的叙事形式改换成了现代小说的叙事形式。《水浒传》作为章回体长篇小说,尚带有古代讲史话本的形式特征:每回开头和中间使用“话说”“且说”“再说”,以重复前文内容的方式进行衔接,帮助听众回忆前面所讲的故事;每回的结尾使用“欲知……且听下回分解”埋下伏笔,维持听众兴趣。然而,将话本译成可随时往前翻看的英文小说,此类衔接不免成为冗余信息。

杰克逊通过删节和改写提炼出紧凑故事情节。在形式方面,省略每回开头和中间的程式化套语,使用 We will now relate...^[24-25]意译“且听下回分解”^[24]。在内容方面,省译、总结或转述原文中重复冗余的叙述。如原文第四回末、第五回初,智真长老分别对鲁智深说“我这里决然安你不得了”^[24]，“智深，你此间决不可住了”^[24]，意义重复。杰克逊仅保留了后者^[25]，前者省略。由此，原文通过翻译消除或减弱外来者的驱壳，改换形式在异国他乡获得新的生命力。

相比之下，赛译则倾向于亦步亦趋的异化翻译。在形式方面，直译原文的程式化套语，如将“且听下回分解”译为“Pray hear it told in the next chapter”^[26]。在内容方面，保留原文中承上启下的情节转述，并尽

量贴合原文。赛译的异化翻译强调忠实，以原文为导向，但译本冗长，可读性降低；杰译的归化翻译以读者为导向，译本与原文虽非字字对应，但胜在短小精炼，以传意为主，可读性高。

因此，爱德文·杰克逊的归化翻译策略和意译翻译方法表现出种族中心主义的翻译倾向，对文化负载词的浅化处理和叙事程序的改写强化了欧洲中心的神话。然而，翻译的本质属性仍然避免不了异质因素进入译入语场域。表现为：音译少数文化负载词，如“衙门”与 Yamen；直译部分绰号，如“石将军”与 Stone General，“铁扇子”与 Iron Fan，“双头蛇”与 Double-headed Snake，“小李广”与 Small Li Guang。少量的异质性文化资本点明了文本的翻译属性，并不影响整体故事的流畅性。因此，正统的翻译规范并非完全限制异端的表达。同属译者的心智结构，异端也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正统，逐渐缩小种族中心主义的覆盖范围。

(二)2010 版杰译研究

进入 21 世纪，塔托出版社(Tuttle publishing)决定再版杰译，爱德文·劳(Edwin Lowe)负责编辑。东西方交流的扩大意味着获得共识的信念领域也随之拓宽，西方读者群体对东方文化的审美期待和接受能力不断提高。因此，劳对 1963 版译本的编辑，正是当今读者所处信念领域对 1963 版所处信念领域的校正。

1. 人名音译的修改

杰克逊在 1963 版全译本中，使用威妥玛式拼音法音译汉语人名，如将“武松”译为 Wu Sung，“鲁达”译为 Lu Ta。爱德文·劳在 2010 版中将威式拼法改为汉语拼音法，如 Wu Sung 改为 Wu Song，Lu Ta 改为 Lu Da。威式拼音是英国人威妥玛等合编的汉语注音规则。《汉语拼音方法》由 1958 年中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1982 年由国际标准化组织(ISO)采用作为国际标准，之后渐渐成为正统的汉语罗马字母拼写法^[27]。爱德文·劳的校对侧面证明了威式拼音的权威地位被取代，退出了当代西方读者的信念领域，而汉语拼音作为文化资本的

合法性得到承认。

2. 西式称呼头衔的修改

杰克逊 1963 版译本中大量使用 Mr, Mrs. 等头衔翻译称呼语,以迎合对中国称谓体系少有接触的 20 世纪英美读者的指称习惯。在 2010 版的翻译场域中,读者的信念领域对东方文化的认可度增高,希望读到更具异国风情的译本,而上述归化式翻译与《水浒传》所建构的中国宋朝语境格格不入。因此,爱德文·劳全面校订了这类称呼的翻译,如“西门庆”由 Mr. Westgate 改为 Ximen Qing,“王婆”由 Mrs. Wang 改为 Grandma Wang,“潘金莲”由 Mrs. Wu 改为 Pan Jinlian 等,以音译的人名为西方读者营造具有东方图景的译本。

3. 度量衡的修改

杰克逊 1963 版全译本按照数值将中式度量衡译为西式度量衡,如“十里”^[24]译为 About three miles^[25],“十斤”^[24]译为 Ten catty^[25],“六十二斤”^[24]译为 Ninety pounds^[25],以令 20 世纪西方读者对文中数值有量化具体的认识。然而,随着信念领域的不断扩大,中式度量衡从意见领域进入当代外国读者的深层认知结构。爱德文·劳使用更具中国特色且为当代外国读者所熟知的度量衡拼音译法,将“十里”译为 Ten li^[23],“十斤”译为 Ten jin^[23]等,令译本更符合当代西方读者的认知结构。

4. 书名英译的修改

杰克逊在 1963 版中将《水浒传》译为 *Water Margin* (“水边”或“水边的故事”)。爱德文·劳在 2010 版中做了两处修改:*Water Margin* 之前加上定冠词 The,之后加上副标题:*Outlaws of the Marsh*,成为 *The Water Margin: Outlaws of the Marsh*。首先,加上定冠词 The,表明《水浒传》经过爱德文·劳的编辑,在西方场域中再次正式出版。定冠词 The 用于语境中第二次出现名词前,是对第一次出现的名词的特指。*The Water Margin* 是新版《水浒传》杰克逊译本对自身独立性的宣告,也是爱德文·劳对其自身编辑主体性的宣告。其次,*The Water Margin* 之后加上沙博里版《水浒传》译名,是对沙博里版《水浒传》译本名气的借用,并借此表明 *The Water Margin*

塑造的人物是“沼泽边的不法之徒”。通过凸显其自身的独特性,并积极向读者信念领域中的权威译本靠拢,使 2010 版《水浒传》英译本可在西方文化场中获取一席立足之地。

爱德文·劳的编辑工作调整了 2010 版全译本的信念结构,令其更符合 21 世纪英美读者的接受水平和审美期待。这是一个编辑按照自身双语文化惯习,利用自身文化资本对原译本进行干预的过程。简言之,一个译者所持信念与编辑所持信念互相斗争的过程,但爱德文·劳在前言中表明“自己仅是编辑、校对,并非改编、重写杰译本”^[23]。由此可见,2010 年版的杰译是各行动者在新的翻译场域内经历斗争与合作后的产物。

四、结语

翻译场域中的信念,作为对正统的误识,在资本上表现为译者是否有资格入场域实践,在惯习上表现为译者种族中心主义的翻译倾向或尊重多元文化的翻译倾向,在场域上表现为译者是否能够识别场域中的利害关系。根据翻译作为跨场域资本流通的性质,成功的译本需尽量贴合读者的信念领域,并引入适量的异质因素。最终译本是多个行动者所持信念之间的斗争与妥协。

将“信念”引入《水浒传》杰译翻译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杰克逊在西方的生活轨迹,令他认同带有种族中心主义的倾向作为翻译场域中的正统。由于掌握丰厚的跨文化资本,被选择为《水浒传》的译者后,杰克逊在语言和文化上向目标读者倾斜,通过删节、改写塑造出一个通顺、简洁的译本,以区别于强调逐字对译的赛译。这是在识别场域内利害关系之后做出的正确决策。*Water Margin* 作为英美文化场域的新成员,逐渐获得立足之地,在英国和中国香港颇受欢迎^[6]。作为最终产品的译本,被大多数行动者所认同,归于可研究、可实践的对象,本身就意味着“信念”的诞生。而爱德文·劳在当代文化场中增加原版译本的异域色彩,并借用沙博里译本的译名,背后是 20 世纪信念领域与 21 世纪信

念领域、译者所持信念与编辑所持信念的磨合。

由此可见,跨文化交流中文化资本的流通并非对等地转换。在多数情况下,原文与译文、忠实与流畅、形式与意义难以两全,二者终要取其一,以迂回策略帮助原文在译入语场域中求得生存,以期获得更多的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随着跨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两边场域的信念将有更多的重合部分,原文将在译入语场域中获得更强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 [1] 汤金霞,梅阳春,黄文.《水浒传》英译研究:成绩、问题与对策[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119-125.
- [2] 王畅.《水浒传》杰克逊译本中习语翻译的补偿研究[D]. 大连:大连海事大学,2008.
- [3] 陈丽丽.《水浒传》中带标记的被动句式英译研究[D]. 大连:大连海事大学,2008.
- [4] 黄昭奎. 操控理论视角下《水浒传》的文化词语翻译[D]. 天津:天津财经大学,2013.
- [5] 魏莉.《水浒传》三个英译本的比较研究——兼谈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J]. 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1(3):219-222.
- [6] 孙建成. 水浒传英译的语言与文化[D]. 天津:南开大学,2007.
- [7] 刘克强.《水浒传》四英译本翻译特征多维度对比研究[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 [8] 沙博里.《水浒传》的英译[J]. 中国翻译,1984(2):29-32.
- [9] 邵璐. 翻译社会学的迷思——布迪厄场域理论释解[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3(3):124-130.
- [10] Bourdieu P.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 [11] Davids. Culture and power: the sociology of pierre bourdieu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 [12] Bourdieu P. The logic of practice[M]. Standford: Stand-

- 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13] Bourdieu P.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 [14] Bourdieu P. Sociology in question [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1993.
- [15] Inghilleri M. Bourdieu and the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J]. The Translator, 2005, 11(2): 125-145.
- [16] 陆志国. 茅盾五四伊始的翻译转向:布迪厄的视角[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3,36(2):89-94.
- [17] Simeoni D. The pivotal status of the translator's habitus [J]. Target, 1998(1):1-40.
- [18] Sela S R. How to be a (recognized) translator: rethinking habitus, norms, and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J]. Target, 2005(1):1-26.
- [19] 曹明伦. 以所有译其所无,以归化引进异质——对新世纪中国译坛异化归化大讨论的回顾与反思[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32(4):114-119.
- [20] Venuti L. Rethinking translation: discourse, subjectivity, ideology [M]. London: Routledge, 1992.
- [21] 王丽娜.《水浒传》在国外[J]. 武汉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1):118-127.
- [22] Lefevere A.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5.
- [23] Shi N A. The water margin: outlaws of the marsh [M]. Tokyo: Tuttle Publishing, 2010.
- [24] 施耐庵,罗贯中. 水浒传[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 [25] Shi N A. Water Margin [M]. Hong K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63.
- [26] Shi N A. All men are brothers [M]. New York: The John Day Company, 1933.
- [27] 张霄军. 中文音译规范化的自动实现——以威妥玛-翟里斯式拼音转写为例[J]. 中国科技术语,2016(6):13-16.